

## 20 世纪 50 年代初 台湾当局对德“建交”活动 始末

陈 骏

**摘 要：**20 世纪 50 年代初期，台湾当局展开了旨在谋求与西德“建交”的一系列活动。台湾不仅动用了其在欧洲、美国等地的“外交”资源，还谋求获得美国的协助。最终，西德出于“单独代表权”、不愿卷入中国问题的争论以及对中国大陆市场的兴趣等考虑拒绝了台湾的提议，而英美等国际因素和中国对德政策也在这一过程中发挥了重要影响。台湾当局的“建交”活动虽然失败，但在这一期间的对德工作并非一无所获。

**关键词：**台湾当局；西德；“建交”；中国；美国

**作者简介：**同济大学 德国问题研究所 助理教授 上海 200092

**中图分类号：**K518；D827.5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4871(2016)03-0096-16

今天的联邦德国分别是中国大陆和台湾在欧盟的最大贸易伙伴，其互相之间所进行的政治经贸文化交流对欧亚大陆的和平繁荣起着重要的作用。而 1949 年先后成立的联邦德国（本文中简称西德）与中国政府在冷战中分属东西方两大阵营，陷入了敌对的关系。然而与美、英、法等西方大国不一样，西德既未与同属西方阵营的台湾当局建立“外交关系”，又未承认新中国。这种状况为上

世纪 70 年代中德两国展开建交谈判并成功建立外交关系减少了诸多障碍。不过这种状态的形成却并非易事。50 年代初期，台湾当局曾联合美国政府向西德政府发起了强烈的“建交”攻势，并一度与西德政府进行了密切的往来。这不仅是 1949 年后中德关系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事件，也直接体现了冷战初期西方阵营内部的相互关系。

就对此问题所进行的研究而言，冷战结束后，德国学者开始用德国的档案材料进行考察。<sup>①</sup> 台湾“中央研究院”欧美研究所副研究员陈郴对二战结束初期至 1955 年台湾当局宣布对德终止战争状态期间的西德与国民政府关系进行了考察，但对台湾当局对西德政策的发展过程、对德联系渠道、台美之间如何就此进行交涉和中共的影响因素等问题缺乏探讨。<sup>②</sup> 中国大陆的相关研究则更为薄弱，在提及 50 年代台湾与西欧国家的关系时，有的文章认为当时“欧洲对美国言听计从”，甚至错误地认为“联邦德国一直与台湾保持着外交关系”。<sup>③</sup>

为了能对当时台湾对德政策及其影响因素有一个更全面的认识，本文利用台湾、中国大陆和德国的相关档案文件，以更多的国际史视角，对台湾当局对德政策的发展过程、对德联系渠道、台美之间的交涉和中国政府在其其中的影响进行研究。

## 一、1949 年前后的中德关系

1945 年二战结束后，随着纳粹德国的败亡，美、英、法、苏 4 大国于 1945 年 9 月 20 日全面接管了德国的对外事务，并开始陆续邀请曾参加对德、意、日轴心国作战的 15 个国家派遣军事代表团进驻德国，以加强盟国间的联系，并协调对德管制政策。<sup>④</sup> 中国作为主要战胜国和联合国 5 个常任理事国之一，参与了占领和管理德国的工作。中国驻德军事代表团于 1946 年 1 月 21 日在柏林美占区成立。这是 1941

---

<sup>①</sup> 主要参见 Mechthild Leutner (Hrsg.),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und China, 1949 bis 1995. Politik-Wirtschaft-Wissenschaft-Kultur*, Berlin: Akademie Verlag, 1995; Alexander Troche, *Bonn wird in Meikong verteidigt, Die Ostasienpolitik der Bundesrepublik in China, Taiwan und Südvietnam, 1954 - 1966*, Düsseldorf: Droste Verlag, 2001; Tim Trampedach, *Bonn und Peking: Die Wechselseitige Einbindung in außenpolitische Strategien 1949 - 1990*, Hamburg: Institut für Asienkunde, 1997.

<sup>②</sup> 陈郴：《战后德国与中华民国外交关系的演变，1945 - 1955》，载《档案季刊》，2011 年 3 月，第 10 卷，第 1 期，第 4 - 15 页。

<sup>③</sup> 刘佳雁、张华：《台湾与欧盟关系演变（1949 - 2000）》，载《台湾研究》，2009 年第 6 期，第 30 - 36 页；杨丹伟、徐国利：《欧盟：台湾对外关系的新方向》，载《欧洲研究》，2004 年第 6 期，第 122 - 136 页。

<sup>④</sup> 马振骧、戚如高：《蒋介石与希特勒——民国时期的中德关系研究》，北京：九州出版社，2012 年版，第 429 页。

年中国政府正式断绝与纳粹德国的官方关系后,在德国建立的具有官方性质、且承担领事和对德占领事务的机构。在1949年东、西德政府分别正式成立前,驻德军事代表团承担了类似于大使馆的职责。<sup>①</sup>此外,中国政府不仅计划恢复中德经贸关系<sup>②</sup>,还拟定了相对宽容的对德和约草案<sup>③</sup>。同时,中方也相继恢复了位于汉堡(英占区)和斯图加特(美占区)的两处领事馆。

1949年9月至10月,国际冷战和中德两国国内局势都发生了重大变化。9月20日,联邦德国政府正式在波恩成立,其内政外交秉持敌视社会主义阵营的意识形态。而当时中国正值国共内战末期,国民党当局在中国大陆的统治已濒临结束,并准备撤往台湾。10月1日和7日,新中国和民主德国政府相继成立。作为社会主义兄弟国家,双方很快建立了正式外交关系。因此,若联邦德国再与退往台湾的国民党当局建立“外交关系”,那么中德关系就将会出现完全按意识形态来划分营垒的状况。

尽管此时在中国大陆国民党军队已兵败如山倒,但国民党内部以时任“行政院副院长”和中德文化协会理事长的朱家骅<sup>④</sup>为代表,仍在国民党中央非常委员会上提出了“赶快承认联邦德国政府,并与其恢复邦交”的建议。这一提议得到了国民党中央的一致通过并交由“外交部”办理。<sup>⑤</sup>

1949年10月28日,朱家骅通过其德国友人,向西德首任总理阿登纳转交了一封亲笔信,祝贺阿登纳当选。他在信中表示,“中德外交关系虽曾短期中断,但在精神上双方的传统友谊却从未改变,两国的外交关系望能重新建立”。<sup>⑥</sup>1950年春,中德文化协会在台北复会,朱家骅任理事长,杨继曾、俞叔平

① 该团全称“驻德联军管制委员会中国军事代表团”。桂永清、黄琪翔和缪培基等国民政府军政高官曾出任该团团长。

② „Dokument No 148: Ausarbeitung von Shen Jinkang, Handelskommission des chinesischen Finanzministeriums, November, 1945“, in Mechthild Leutner (Hrsg.), *Deutschland und China 1937 - 1949: Politik-Militar-Wirtschaft-Kultur*, Berlin: Akademie Verlag, 1998, S. 465 - 466.

③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德外交密档,1927-1947年》,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97-101页。

④ 早在上世纪40年代初,民国政府和纳粹德国关系从恶化发展到断交之时,朱家骅便曾凭借其在德人中有广泛交际和影响的身份在中德两国之间积极活动,谋求两国交好及战后恢复关系。中国大陆学者对此问题的相关研究主要参见李乐曾:《欧战爆发后朱家骅的对德立场和联德行动》,载《民国档案》,2010年第1期,第123-129页;李乐曾:《抗战初期国民政府的对德政策——以朱家骅使德计划为中心》,载《德国研究》,2009年第3期,第45-51页。

⑤ 胡颂平:《朱家骅先生年谱》,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69年,第81页;俞叔平:《中德文化关系之回顾与前瞻》,载大陆杂志社编:《朱家骅先生逝世纪念册》,台北:中央印制厂,1963年版,第274-279页,此处第277页。

⑥ „Dokument No 1: Chu Chia-huas Brief an Strowe, 28. 10. 1949“, in Mechthild Leutner (Hrsg.),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und China, 1949 bis 1995. Politik-Wirtschaft-Wissenschaft-Kultur*, S. 49.